



中医

大家小絮

张克澄

熟悉我家的都知道我母亲陆士嘉的舅舅是施今墨。舅舅疼爱这个好学的外甥女并且资助她留学德国。施今墨乃民国京城四大名医之一，在西医东渐，刚传进中国时，他就主张并运用西医看病；思想之开明、医术之高超，名震京华，政要纷纷找他问诊，也是已知的唯一为孙中山、蒋介石、毛泽东都看过病的中医。施今墨众多弟子中尤以其大女婿祝谌予最得真传。因之，施、祝两代名医留下了许多传奇。下面仅介绍和清华有关的。

1966年，我在北京26中（汇文中学）读高三，每两周返家一次。该年4月，在校生病，校医诊断为重感冒，开了药嘱多喝开水多休息，我老老实实在宿舍里躺了个把星期也不见好，好不容易挨到周六回家。

周日，大表姨夫妇从城里来串门，父母照例留午饭。饭桌上，我病歪歪食欲全无，母亲解释说患重感冒，吃点药就好了。表姨父祝谌予仔细看着

我，令伸出舌头，又拨开眼皮看，一挥手：跟我上楼！

跟他进了楼上厕所，嘱撒尿，弯下腰细看马桶里的尿液，然后“嗯”了一声下楼。回到座位，表姨父郑重地告诉父母：

“这不是重感冒，是肝炎！最近城里肝炎流行厉害，他一定是传染上了。”为慎重起见，他建议父亲马上带我到校医院查血，查肝功能。

父亲不敢怠慢，带着我去了校医院。拿回结果一看，转氨酶3900多，急性黄疸型肝炎！表姨夫对我说：“你现在正处于传染期，得马上住院隔离！”见我有些紧张，他笑道，“不用紧张，吃我的药，包你好。记住，到了医院，给你开的西药，你全别吃，吃了，我的药就不灵了，还会留下后遗症，肝硬化。”

这天，表姨夫一直忙到天擦黑才离开。

我住进了清华校医院肝炎病房，校医院书记张寿昌早就耳闻施今墨祝谌予翁婿俩的医术，对祝大夫的要求很尊重，

同意我住院期间只服家里送来的中药。两周过去后，我的转氨酶降到了1300以下，恢复正常。和我同屋的是两位在清华协作的工程兵军官，比我早来两星期，病情一直没有好转，看我吃中药，也要求改中医。服药后效果同样，两周后他俩就出院了。

此时肝炎悄然降临清华，校医院肝炎病房人满为患，大有进一步发展之势。张寿昌从我们三人身上看到中医治疗的奇效，遂与祝大夫商议，请他来清华协助治疗。祝谌予时任中医学院教育长，慨然允诺，在清华校医院开设了中医肝炎门诊，自此奔波于东直门与清华之间，直到文革兴起，大家忙于革命，治病退居末席方罢。

经过祝大夫的一番治疗，病人纷纷痊愈，肝炎在清华园得到了抑制。为防患于未然，祝大夫又提出在各个学生食堂用大锅熬中药，组织学生早晚到食堂必喝。说来也神奇，清华再也没有人染上肝炎，躲过

了当年北京的这场灾难。

1966年的清华在校生，你们还能回忆起：火热的大字报没开始之前，相当一段时间，食堂门口大铁锅里每人必喝的那碗中药汤吗？

也许有人会问，那是什么汤，如此神奇？其实这里只用了一味中草药，叫茵陈。

一味药，一锅汤，一张方，外加学会了开方子的张寿昌。

故事还未结束，当年表姨夫许诺我说不留后遗症。此言不虛，与我同时得急性黄疸型肝炎采用非中医疗法的人，不少后来转成肝硬化；而我，早已习惯了体检触诊时，医生碰到我柔软的肝部总是疑惑于我曾经患过急性肝炎，怎么恢复得如此之好？

文革中，清华大批教师在江西鲤鱼洲得了血吸虫病，肝脏受损。父亲的学生万锦堃就是其中之一。父亲爱惜他，将他介绍给祝谌予（彼时施今墨年岁已高，轻易不去烦劳他）。万锦堃不知什么原因迟迟没有去，父亲就到祝大夫那儿把方子抄了回来。方子分干湿两类，系祝谌予根据多例为清华教师治疗经验总结得来，一种是大便干燥型，一种是大便溏稀型。父亲不清楚万锦堃属哪种，两张方子都转交给他了。

三十多年过去，万锦堃始终珍藏着这两张方子和老师的便条。每每念及，心中便涌起阵阵暖意。

文革期间，祝谌予遭到不公平待遇，一家6口被迫挤住在两间小屋中，但他仍利用休息时间在家中给找上门来的病人看病，并坚持下来。十九年间，祝谌予在家中接待过的病人达五万人次，平均每天7人次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：分文不取而且拒收礼物！

清华子弟毕可纫只要一提到中医、提到祝大夫就激动不已。

毕可纫的父亲是清华老图书馆长毕树棠。抗战期间，毕树棠衔校长梅贻琦之命留守清华园与日寇周旋，是梅贻琦信得过的人之一，为清华立有大功，日后却成了他的罪名。

1973年10月中旬，饱受冤屈的毕老先生突患脑溢血，所幸抢救及时，命保住了，却半身不遂。毕可纫夫妇竭尽全力将父亲接回家，定期从校医院拿点药安慰父亲那颗绝望的心。日子就这么凄惶地过着。

又是一天取药日，毕可纫遇见了张光斗夫人钱枚茵。钱听说毕树棠的病情后摇了摇头，建议她们另想办法。毕可纫也摇头，说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有什么办法？要钱没钱，要地位没地位，能拖一天算一天罢。钱将毕拉至一边，悄悄地告诉她：你去找陆先生！

陆先生指我母亲陆士嘉。

毕可纫夫妇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我家，应门的正好是母亲。

母亲态度很和蔼，听完他俩的介绍后转身上楼了。毕可纫回忆说她一看见陆先生转身，

就知道父亲有救了，陆先生没有嫌弃他们，她上楼安排去了！那个温暖的背影永远刻在了她的心上。

果然，母亲从楼上下来，交给他们一封信，嘱马上去找祝大夫。

两人欣喜万分地来到祝大夫工作的医院。祝大夫一边看信，一边听他俩介绍病情，最后点点头说，“事不宜迟，马上治疗。”

毕可纫夫妇连连说，“您看哪天方便？我们把父亲送来。”

祝大夫挥手拒绝，“老先生年岁已高，这种病不宜搬动。还是我去吧！”

两人惊得目瞪口呆。

转天晚上，祝谌予带着儿子肇刚登门，直奔病人，一眼没看家属精心准备的水果和点心。此时是11月中旬，距离发病一个月。

都说中医见效慢，毕家做了长期服药的准备。谁知效果惊人，中间只调了一次方子，到1974年元旦前后，老先生便能坐起来了。太鼓舞人心啦，接着喝！又过了一个多月，到农历新年时，毕树棠便行走如常。前后不过三个月！

此事轰动清华园，毕可纫说那段时间她家人来人往热闹非凡，有看奇迹的，有打听祝大夫的，也有直接来抄方子，照方抓药的。方子抄走了，却没听说有吃好的。

辨证论治，一人一方，量身定做，中医就这么神奇！